

部 定 大 學 用 書

國 史 大 綱

修 訂 本

上 冊

錢 穆 著



國 立 編 譯 館 出 版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部定大學用書

國史大綱

修訂本

上册

錢穆著



國立編譯館出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部定大學用書

國史大綱

修訂本

下冊

錢穆著



國立編譯館出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修訂一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修訂十二版

部定大
學用書

國史大綱 上冊

基本定價四元四角正

著者 錢 穆

出版者 國立編譯館

發行人 朱 建 民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修訂一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修訂十二版

部定大
學用書

國史大綱 下冊

基本定價三元二角正

著者 錢 穆

出版者 國立編譯館

發行人 朱 建 民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引論

(一)

中國爲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

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

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

以下，明白有年可稽。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

自魯隱公元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

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

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齊治通鑑託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三十四年。

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二曰紀

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

此本尙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

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

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爲其國民最缺乏國史智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智識與歷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爲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智識。材料累積而愈多，智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智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的

之聯絡。歷史智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爲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欲求歷史智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鑒於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爲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變幹強爲，求其實現，鹵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智識者，又不僅於鑒古而知今，乃將爲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也。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爲其所愛而奮鬥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觀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爲上帝者，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爲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爲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爲父母，爲所愛者。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爲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爲其民族真奮鬥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爲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呼愛國。此其爲愛，僅當於一種商業之

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彼豈復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脰決胸而不顧，以效死於前敵者，彼則尙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真誠之深愛，彼固以爲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於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智識，其要在此。

(11)

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宜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傳

統派主於記誦，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爲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則起於清之季世，爲有志功業急於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後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爲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甯以記誦一派，猶因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爲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爲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

情。彼惟尙實證，夸創獲，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爲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雖然，革新派之於史也，急於求智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於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爲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縮合歷史於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爲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智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案。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僞造智識者。智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爲無識也。

(三)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遞變。約言之，亦可分爲三期。其先當前清末葉，當時，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彼輩謂

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於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彼輩對當前病證，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爲明日之黃花矣。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於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爲孔學所掩脅，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爲老學所麻醉。故或則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則歸罪於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一千年來之思想，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邱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於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痾積海，莫如並廢文字，創爲羅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爲良弓之藏。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後面常爲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於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於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爲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爲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爲。雖然，國人之所求於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瞭解，以相應於其當身

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爲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於孔老之爲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覩，闇習而無知，何願更爲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甌，而我國人仍將爲無國史智識之民族也。

(四)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材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智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爲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尙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爲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網羅詳備言，爲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爲主，後人譏之爲相斫書焉。又其次爲史記，乃爲以人物爲中心之新史，徵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然露頭角也。又其次爲漢書，爲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

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復生通史之新要求。於是而有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為以制度為骨幹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又繼而有通鑑，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鑑紀事本末，取材只限於通鑑，則貌變而實未變也。於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於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代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於全史整面之敘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

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此因元清兩代皆以異族入主，不願國人之治史。明則其間，光輝乍闕，翳霾復興，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於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願為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一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為全部歷史所

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候，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而興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盡氣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日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由此想見矣。

(五)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系統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將效記誦考訂派之所為乎？則必泛濫而無歸。其將效宣傳革新派之所為乎？又必空洞而無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則曰學術思想，又次則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幹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後，分主客取捨於其間乎，抑兼羅並包，平等而同視之乎？

曰，姑捨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今人若為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則必與為一音樂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即為一網球家作小傳或年譜，則又必與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

存滅迥別矣。何以故，以音樂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與運動家不同故。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又與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國家亦然。寫國史者，必確切瞭解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然反言之，亦惟於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如此則循環反覆，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乃並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要之必於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則一也。

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以其忽然投入於網球家之環境，而從事於網球之活動故。其他一切飲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無所異於人。若爲網球家作年譜，而鈔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則某年音樂大會，其人既無預，某年歌曲比賽，其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於音樂史上絕無一面。不僅了不異人，抑且有不如無。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網球家之生命，不能於音樂史之過程中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屢爭不捨，僅而後得之代表民意機關，如英倫之大憲章與國會之創與而無有也。又求一轟轟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國人權大革命之爆發，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文藝復興運動以來，各國學者蓬勃四起，各爲其國家民族創造其特有新興之文學而無有也。又求一如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幟，以與羅馬教皇力抗，軒然興起全歐

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束縛於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經濟，求一如噶馬如哥布鑿空海外，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歐美社會之光怪陸離，窮富極華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沉眠於封建社會之下，長夜漫漫，永無旦日矣。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趨，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覩亦在是。迷於彼而忘其我，拘於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誇道者，我乃一無有。於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彼方目眩神炫於網球場中四圍之采聲，乃不知別有一管弦競奏，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某先後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啣接，而劃分爲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天闕，而衡論其文化之爲進退。此一法也。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啣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爲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分部之

變。於諸異中見一同，即於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爲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爲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著眼於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爲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漢我即著眼於當時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爲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著眼於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爲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係。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故曰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

(七)

今於國史，若細心審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現象，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鬥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線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盪中產生。若以此意

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鬥爭，不幸此等常爲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線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夫洪楊爲近世中國民族革命之先鋒，此固然矣。然洪楊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建設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鬥爭，常不爲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國史非無進展，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的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學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佔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爲文學家之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輓。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采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八)

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一統政府之創建，已爲國史關一奇迹。近人好以羅